

第十六章 四度访美

1931年太平洋国际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准备在中国的杭州召开三年一次的大会时,我曾被邀请担任大会主席。对于不了解太平洋国际学会性质的读者,这里不妨作一介绍。顾名思义,该学会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组织,主要研究环太平洋各国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这一组织是非官方的,会员包括11个国家的团体,皆无政治色彩和党派背景。学会的活动经费由各地自己解决,主要来自个人和研究基金的赞助,同时,各地理事会还要向太平洋学会总理事会提供部分资金。学会的行政工作由暂时设在纽约的国际秘书处负责。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很快被任命为驻美公使,因此,胡适教授接替我担任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主席,这次会议因中日冲突的爆发后来改在上海举行。1939年,学会决定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城举行年会,学会秘书长爱德华·卡特先生(Edward Carter)来到上海和重庆,商议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事宜。那时我已退休,正住在上海,因此又被邀请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刚好我领导的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工作正告结束,我很乐意接受此项任务,为国尽点绵薄之力。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次出行决定取道欧洲,再往美国,我先到香港与代表团另一位成员汇合,商讨我们在会议上要提出的政策和计划。虽然与会者并非官方代表,但会议上和学会的出版物

上对太平洋地区各种问题所发表的言论,对政府和舆论都会有相当影响。每一会员国被允许派出一个 10 人的代表团,因旅费昂贵,中国决定只派 5-6 人,再从已在美的我国同胞中邀请几位。

此次与我同行的除了我的秘书之外,还有我的二女儿和一个外甥女,她俩正好要返回美国去上学。途经新加坡和槟榔屿时,我们登岸游览。在新加坡我遇到了多年未见的前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博士,我第一次见到他是 1906 年在北京,那时,他充当民政部尚书肃亲王的顾问。林博士年轻时就很出名,因他曾在南洋群岛为当地华侨待遇问题积极活动,为他们争回不少权益,并在他们中播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他虽然是个职业医生,但对政治问题始终抱有极大的兴趣。他的英文造诣很深,是国内最早用英文著书的作者之一。他的著述论述的都是关于中国及其改革的问题。他担任由新加坡橡胶业侨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大学的校长数年,因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退居南洋老家。他虽年逾古稀,身体仍很健康,并且仍然关注世界时事政治。由于我们搭乘的轮船停留时间很长,因此我们得以游览吉隆坡,参观当地素丹的皇宫以及该皇宫附属的一座典型的中国式私家戏台。

离开槟榔屿后,我们在船上已经意识到欧洲战争正在逼近我们。时值 8 月底,船长肯定已接到命令,为避免遭受袭击,夜间航行不开灯,且迂回前行,不走直线。当时有人听说,一艘德国特快商船“格尼森瑙”号好像在尾随我们,该船能立即装上武器,袭击其他船只。不过,后来证明此说系无根据的谣传。此外,船上还纷纷传说我们的船只将不得不放弃走苏伊士运河,而绕道好望角。

船抵科伦坡时,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照样上岸参观游览。9 月 1 日,船抵孟买,旅客才得到确切消息,该船将绕道好望

角前往欧洲。船上装足了淡水、燃油和粮食,以便路上不再停留,直驶英国。我们代表团成员别无选择,只好暂留孟买,静待事态发展,再作决定是否继续前往美国,万一会议延期举行,就打道回国。幸运的是我国驻孟买副领事非常活跃能干,他想方设法让我们感到舒适和愉快。9月3日,我们从报上读到了欧洲爆发战争的消息,与我们住同一旅馆的一些德国人被押走了,其中有的是商人。他们被关在一个集中营里。德籍妇女没有押走,仍留在旅馆。

战争爆发对我们代表团的首要影响是英镑贬值,我们从香港开出的英镑信用证损失惨重。在孟买的纽约花旗银行里,挤满了波斯人和印度人,争开美元账户,英镑与美元的汇率跌至1英镑兑换3.85美元,损失20%以上。

我们到达孟买后不久,接到卡特先生的电报,告知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如期举行,但地点改在美国的弗吉尼亚比奇,并嘱我继续前往。电报中还说,由于欧洲爆发新的战争,且可能会有相当多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因此,这次会议尤为重要。此时,有人建议我利用这次机会与一些印度的领导人会面,特别是尼赫鲁,他那时刚刚非常成功地访问了我国战时首都重庆后回到印度。

我们在孟买停留的时间出乎意料地竟有3个多星期,利用这段时间,我们走访了孟买附近地区,看了看印度的情况。我们看到,孟买是一个相当欧化的城市。从《印度年鉴》上,我们得到了我们所需的官方信息和统计数字;又从一位印度人撰写的关于佛教的英文小册子中,获得了一些印度佛教的知识;阅读尼赫鲁先生的《世界史一瞥》(*Glimpses of World History*),使我们了解了尼赫鲁的思想和关于世界的观点,《世界史一瞥》实际是尼赫鲁在狱中写给他女儿的一系列家书,充满了对女儿的谆谆教诲和开导。这本

书的出色之处在于完全凭记忆用漂亮的英文写成,尼赫鲁写作时手头没有任何参考书籍。我特别仔细地阅读了关于中国历史的章节,总的来说阐述得非常清楚和正确。

我们还有幸访问了几个著名的印度教徒家庭,从与他们的交谈中,获得了他们关于印度内政外交的看法。看来,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不小。我们还看了几部印度明星主演的电影,了解了一些印度社会生活理念和传奇故事,而到浦那城看过赛马后,才明白了印度土邦主和富豪们为什么嗜好养马,以及他们是如何仿效阿迦汗的马在英国赛马场上取得成功的,也许养马赛马可以使他们忘掉对政治的关注和责任。

在副领事的陪同下,我们前往沃尔塔拜访尼赫鲁先生,当时,尼赫鲁正与甘地先生及其他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成员们在那里开会,起草一份决议,阐述他们关于印度在新的欧洲战争中所处地位的观点。我们花了一夜的时间才抵达沃尔塔,尼赫鲁先生热情地欢迎我们,并几乎用了一整天给我们讲述他在重庆的访问经过,以及他从重庆带回的很多纪念品,包括国民党领导人的墨迹和与他们的合影照片,我还发现他对苏联和那里的新情况也很感兴趣。

在我们谈到的所有问题上,尼赫鲁先生都十分坦率地表达了个人观点,其作风民主,生活简朴,不过,尼赫鲁先生却是在英国接受了从预备学校到大学的教育,他对英国的教育,印象极为深刻。尽管他多次入狱,但他对加害于他的人,从来没有过出于个人因素的怨言,充分显示出他的伟大人格和高尚情操,这在其他民族里是不多见的。午餐时,我们还见到了其他领导人,其中有诗人奈都夫人(Naidu)、白德尔先生(Patel)和普拉萨德先生(Prasad),还有一位穆斯林。午餐是纯印度式的,除了那位穆斯林有椅子坐之外,其

他人都盘腿坐在阳台地板上,用手从铜盘里抓食用咖喱和其他各种调料拌的米饭。

印度领导人用了一整天,起草、修改、再起草那个决议,直到晚上8点半,会议才结束。因为甘地先生忙于会议,而地方上的印度行政长官又邀请我和尼赫鲁先生出席晚宴,因此,我与甘地先生竟没有时间多交谈,只是互相问候了几句。甘地先生并不像他本人的照片上显现的那样瘦弱和疲惫,但他的衣着和眼镜则与照片上无异,他的相貌与曾访问过北京的诗人泰戈尔大不一样。

附近某邦的首席部长,也系国大党党员,邀请我们访问他的邦政府所在地。我们乘坐他的专车前往,沿途看到一片迷人的乡村风光,不禁使人想起上海至苏州的景色。到了该邦首府,他向我们介绍了几位邦政府成员,并陪我们在城中各处参观,其中有一个大规模的钢铁厂,即塔塔公司(Tata Company)。

由于英国人的俱乐部不准印度人进入,印度人就自建了一所富丽堂皇的俱乐部,只准印度人进入。我向陪同我们的那位长官提到早晨刚进入该城时见到的一座庞大的建筑物,他说他太熟悉了,那是座监狱,他在那里度过两年。有人开玩笑地建议,他应根据狱中的经历,尽快改善狱中条件,因为他并非不可能再次入狱。我还应邀给大学生演讲,听众有1000多人,我讲了中印两国的历史关系,以及继续加强两国关系、互助互利等问题。

在回孟买的火车上,我遇到了著名律师德赛先生(Desai),他也是国大党党员,从他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对英国及其各种制度了解得很深刻、很全面。后来,我有机会认识一位更年轻活跃的国大党成员,是一位极富鼓动性的人物,因此受到英国当局的特别注意。他赞扬尼赫鲁对中国的访问,同情中国的抗日,并希望能有机

会到中国看一看。

印度的一般舆论,对于苏联的内政外交,过去是极为赞成的,但后来因苏联先后入侵波兰和芬兰,因此就开始对其严加抨击。报上载文说,苏联以前严厉谴责别国的野蛮侵略行为,而目前苏联的所作所为,比那些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一行搭乘一艘环游世界的“哈里森总统”号邮船从孟买去欧洲。这是一艘中立船,依照它固有的航线经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然后继续驶向纽约。和船上的不少美国朋友在一起,时间过得挺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开罗,上岸游览了一番。很快又到了亚历山大,再一次上岸游览。我们拜访了英国驻埃及大使,他曾是驻北京公使,我们一起追忆过去,又谈到时下的中国局势。他十分清楚中国目前的情况,特别是发生在天津的事件,就是日本人在天津英租界旁剥光英国男女衣服一事。的确,英国在华的地位比起他在中国任公使时已大大地衰落了。

船抵意大利那不勒斯时,我国驻意使馆成员在码头迎接我们,我们匆匆参观游览了那不勒斯港后,就前往意大利首都罗马。带领我们参观的那个意大利导游对正在进行的战争漠不关心,并抱怨说,我们是他这一个月来接待的第一批游客。当时,我国驻罗马大使馆的代办是已故著名将军徐树铮的儿子(徐道邻)。徐树铮,人称“小徐”,是段祺瑞将军的心腹,1919年,他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撤消了外蒙古的自治。

1925年,当段祺瑞政府备受欧洲各国欢迎支持时,徐树铮出国周游世界,但他回国后不久,在从北京外出时,在廊坊被守军(冯玉祥部)截住处死,当时怀疑他要去南方为他的老上司段祺瑞寻找军事援助,其时,临时执政段祺瑞处境危殆。徐在离开北京的当天

曾来与我话别,谈了他在国外的有趣经历,不料,第二天下午,北京的报上就登载了他被杀的消息。

我们在意大利热那亚港又上了船,继续前往法国马赛。我本想从马赛去巴黎作一短暂访问,与我国驻法大使商议事情。但是到马赛后,发现去巴黎的火车忙于运送军队,本来从马赛到巴黎仅需一夜的时间,而现在至少需要3~4天,于是我只好放弃原计划。

在马赛港又出了点问题,耽误了几个小时后才开船。事情是这样的,在印度上船的一个美国人带了几个孩子和一个奥地利籍的保姆。这个保姆原本持奥地利护照,但是,驻印度的德国领事劝她改持德国护照,因为当时德国已占领了奥地利。在离开印度时已发生过麻烦,但那一次是她的美国雇主出面解决了问题。而这一次,法国当局对她所持的护照绝不通融,最后她被押下船送到集中营去了,她照看的那几个美国孩子非常伤心。

据说在意大利港口时,船上有一两个水手也被拘留了,因为警察听到了他们谈论意大利元首,言语不敬。船到直布罗陀,当英国海军官员上船检查文件时,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位官员爬软梯上船时不慎失足掉入海中,好在他穿着救生衣,没有生命危险,只是浸湿了衣服。文件检查持续了半小时,当时大多数旅客都在睡梦中,之后,我们的船继续开航直驶纽约。船停马赛时,有很多旅客上船,都是撤退归国的美侨,因此船舱里很拥挤,开饭也必须分批进行。一路上,船行驶得相当缓慢,抵达美国港口时,食品和淡水已所剩有限,如再前行,则必须实行配给制了。

我们到达纽约时,世界博览会还有两天就要闭幕,因此我们算是比较幸运,至少可以看个大概。中国没有在博览会建专馆,也没有展品展出,因为政府和商家都认为国内正在抗战,时机不合适。

承蒙博览会主管的热情接待,我们一行参观了通用汽车公司主办的“未来世界”,这是一个高速公路的微缩景观,汽车模型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显示了电学和机械设计领域里的杰出成就。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在几个比较突出的展馆里有选择地看,如同走马观花一般。

参观博览会后,我们前往华盛顿,与我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商讨会议事宜,王正廷大使过去出席过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对会议的政策、程序等知之甚详。同时,我也想乘此机会拜会罗斯福总统。在与罗斯福总统交谈中,罗斯福提到他母系的祖上在帆船时代有位年轻人到过广州,并与十三行中的一位行商结为朋友。他家那位先人一到广州,首先拜访为首的行商浩官,就在他要告辞时,他拿出一份商务契约,请浩官签字。浩官脸色突变,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没再出来。那位年轻的美国人感到莫名其妙,只好回他的办公室去了。他的老板听了他的叙述,训斥了他一顿,因为第一次去拜访,就让人家签约,是极不礼貌的做法。老板要他回去为他的卤莽行为道歉,他照老板的话做了,他与浩官因此成了朋友。此后,两家的友谊一直延续了下来,到1938年时,已近100年了。1938年,罗斯福总统的姨妈,住在巴黎的德兰诺小姐,又收到了从广州浩官家族一年一度邮寄给她的礼物:两箱茶叶。

罗斯福总统提到的浩官(“Howqua”),我在国内时曾在什么书上读到过,我对“Howqua”的来源及与它对应的中文一时想不起来。回到香港后,我对此略作了点考证。十三行,即前清官方认可的设在广州的十余家商贸公司,专门与外商打交道,经营对外贸易。十三行中,有一家名为“怡和号”,东家姓伍,就是伍廷芳先生的伍。伍氏原籍福建,子孙中有一名“秉鉴”的,小名“一浩”,他所

经办的商行就以“一浩”称之。我国商人有个习惯,手中有钱之后,常捐纳个官衔,好在自己的名字后添个“官”字,因此,行商伍一浩就有资格简称为“浩官”。“官”字在福建方言中发音为“quas”,外文书中提到的其他行商名称还有“Khiqua”或“Coiqua、Puankqua、Scunqua、Wayqua”等等

经我国驻美大使的安排,我会见了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其中有一些是老熟人。在美国陆军部和参谋部里,也有不少是我的朋友,其中一个是我的大学同学;其他人,有的访问过北京,有的曾在美国驻北京公使馆任职。在华盛顿外交使团中,也有一些人是我在其他国家的首都结识的。11月7日,苏联大使馆像以往一样举行国庆招待会,我去参加了。但由于苏联军队入侵芬兰,导致苏美关系冷淡,美方没有什么高级官员出席。

与美国朋友交谈,话题自然常常是关于中日战争,通过交谈,我了解到,当1937年战争爆发时,美国外交官和陆军部的官员对于这次战争将持续多长时间,结果将如何,意见分歧很大,陆军部官员竟认为中国不出6个月就将崩溃。而这一次,美国政府的一位相当高级的官员却十分肯定地对我说,中国已经赢得战争。对此,我谦虚地回答,至少我们未被打败。在美国得到的总的印象是,美国的同情完全在中国一边,援华抗日问题正在推进,但进展缓慢,美国将通过停止美日贸易和其他手段向日本施加压力,但这方面的行动更是拖拉,总而言之,美国政策的制订受到公众舆论、国会和立法程序多方面的牵制,无法及时出台。

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即将在弗吉尼亚比奇召开的前几天,我接到蒋介石将军从重庆发来的电报,说想要我担任外交部长,这真使我大吃一惊。电文说,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他打算对

政府的人员作些调整。由于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马上就要开幕,而我对国内政府人事变动的背景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新政府的人员构成及方针政策,我别无选择,只得谢绝,或更确切地说,拖延不作答复。这件事我没有再多考虑,很快就把它搁置脑后了。

当时很可能因为明里暗里对外交部有许多批评,认为该部官员缺乏能力和灵活性,因此上面想趁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进行调整。再者,政府向美国总统多次请求援助,也许认为利用我访美之机,使我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出面洽谈援助,更具分量。当然,这项任务可能已经交给驻美大使,他完全可以像其它任何人一样,不辱使命。那时,中美人上中传言我将接替驻美大使,为了明白无误地消除这种猜测,我尽量避免往来华盛顿。在政府供职几十年后,我非常满意平静而光荣的退休生活,绝无意于再次承担繁重的政府职责,成为万众瞩目之焦点,而有些人对我的想法却感到不可思议,认为是不明智的。

我们从华盛顿乘船到诺福克市,再从诺福克到弗吉尼亚比奇,乘车只需半个小时。我们下榻在弗吉尼亚比奇的骑士宾馆,这是一座现代化的豪华宾馆,因为时值隆冬,除了去佛罗里达的少数中转游客外,宾馆里几乎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人员。引人注目的是,日本代表没有到会,所见的日本人只有一个在秘书处任职的日籍职员,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考虑到远东和世界局势,这次会议其实不应召开。

欧战的爆发,使英、法、意大利三国没有正式代表出席会议,只来了观察员。苏联和其他欧洲小国也没有出席。派出代表团的只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和菲律宾,其中美国代表团人数最多。我第一次出席这种非官方的会议,会议组织安排的

周到顺畅,秘书处成员的精干练达,研究人员的认真精神及其所取得的学术性成果,以及会议议程的严格掌握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席圆桌会议的代表们都想发表自己的见解,为使众多的代表都有机会发言,大会主席严格按照议程掌握会议进度,因此使会议按时召开,按时结束,完成预定计划。

考虑到日本代表没有到会,我国代表在就中日问题发言时和在答复其他代表的询问时,出于礼貌,不得不控制自己的声调和有关内容,更多地讲述中国自身的情况,避免指责对方。毫无疑问,在中日冲突中,中国的抗战是完全正义的,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对此也表示认同,因此我国代表实无需费时费力去“锦上添花”。但如认为日方意见,没人代为申述,那就错了。一些中立人士认真研究过日方观点,并在会上为之作详尽的答辩,他们即使不完全赞同日本,至少也表达了对日本持谅解和袒护态度的第三者的意见。

大会的经过,详细地记录在《太平洋区域问题,1939年》一书中。在该书附录中,载有中国代表团的会议讨论纲要。如果允许对这次圆桌会议提点意见的话,那么我想说,假如讨论发言能严格地遵循大纲规定的程序和议题,那就可以使听众更集中注意力,更好领会发言要旨。但是,发言者往往特别强调自己感兴趣或擅长的话题。的确,出席会议的代表中,有很多是太平洋问题各个领域中的专家,从学术角度来看,讨论确实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他们不过是提出一些类似教条的意见,而这些意见对于复杂多变的外交谈判和处理尖锐的国际冲突并无实际意义。有时候,就某一问题进行讨论是为了得出结论,但往往由于争议太多,结果使人只见一棵棵“树”,而很难发现“森林”。

太平洋国际学会所收集的关于太平洋问题的大量资料和所表述的观点,是极有价值的,该会对某些问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解决方案。对于未来的世界政治家和外交家们来说,他们通过参加大会,不仅可以从讨论中获得有益于实际工作的启示,而且可以应用专家和研究工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以作施政和交涉的根据。

大会结束之后,太平洋国际学会有一项很重要的会务,即选举学会主席,因为原任主席一再恳切表示企盼退休。候选人提出来后,除了有一个国家的分会反对外,其他分会都赞成,但因有一国反对,最后没有作出决定。学会工作暂时仍由原任主席负责,以待各分会达成一致意见。

1937-1938年,我在上海居住时,国际关系学会曾邀请我入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学会,其宗旨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大致相同,会员大多数也是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但是内部组织更健全,且更富活力。由于战争的关系,当时会员分散在各地,但秘书处仍留在上海。该会的刊物《中国季刊》仍照常发行,而该会的一些活动尤其是社会性活动则搞得比较一般。当时有将这两个学会合并的计划,这是个很好的计划,既可以扩大合并后新学会的影响和作用,又可以节省大笔日常开支和重复劳动。但战争的爆发使合并计划不得不推迟,大家都盼望国家重获和平,两学会可按原计划合并。

我第四次访美,有幸会见美国众参两院的不少议员,其中有博拉先生(W. E. Borah),不幸他旋即逝世。博拉先生非常担心美国政府将使美国卷入战争,也担心舆论导向从和平转向战争,就像一次大战时期那样。至于已故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皮特曼先生(Pittman),无论是站在官方立场,还是站在个人立场,他都曾极尽

努力支持我国抗战,他在外交委员会中是颇具影响力的。总的来说,我所接触过的国会议员都是同情中国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自然,议员们都在等待当局的最后举措,并且密切注视舆论倾向,特别是其本人所代表的选区里的民意。

访美期间,我应邀在费城的外交政策学会(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作演讲,我在演讲中谈到,美苏两国即使最终不能联合起来的话,也有达成谅解的必要。在纽约一个关注国际问题的十分重要的组织即国际关系学会上,我的演讲内容是中日战争的爆发与发展。在各种各样的集会上,我始终指出,不管美国人民愿意不愿意,还是早作准备为好,免得一旦“黄袍加身”,不知所措。但是国际间,事先友好的忠告和建议往往不被重视和采纳,等事到临头,无法逃避时才醒悟,则为时已晚矣。

在我访美的一年间,美国人民对于中日战争和欧洲战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说他们转变得快,不是说他们对世界局势忽然彻悟,而是说他们过去认为远东的战火离他们尚远,一时烧不着他们,而欧洲的战火离他们太近,使他们深感不安。现在他们对远东战争也不再超然事外,像以往那样隔“洋”观火了。

当苏联军队入侵小小的芬兰时,美国的同情完全在芬兰一边。那些天里,美国民众群情激愤。就在这期间,纽约一位著名女士邀请我参加在她家豪宅中举行的盛大聚餐会,同席都是与中国友好的人士。女主人提议在吃完鱼这道菜之后,大家谈点共同关心的更为重要的事情,世界局势自然就成为当晚的谈话中心。纽约报纸上关于苏联入侵芬兰的重大新闻,使不少美国人深感吃惊。芬兰,作为一次大战后欧洲惟一偿还美国战争债务的国家,扮演了令那些欧洲大国蒙羞的角色,这些欧洲大国赖债不还,不守诺言,而

从政治角度来看,芬兰扮演这样的角色,令人费解。但就苏联进攻芬兰一事,与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相比较,轻重显然有天壤之别,日本在中国侵占的领土之多,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之惨重,以及对国际正义与公道所产生的恶劣影响,都要超出前者百倍以上。

然而,在美国的报纸上,对于如此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争只是轻描淡写,挂一漏万,而关于芬兰的小规模战争的新闻却天天占据报纸头版,连篇累牍,不厌其详。这分明是轻重倒置,令人不解。当询问在座客人,报纸无疑代表民意,此种现象如何解释?他们竟直率地说,在一般美国人的心目中,一个芬兰人的价值胜过十个中国人!当然,他们也认为,这并不是说,国民所表露的同情,和报纸所表示的支持就完全代表官方的意见,更不代表官方就要实施援助或直接干涉。因此,负有国家责任的政府要员们,固然不可轻估友邦舆论的价值,同时,对于友邦人民火热般的同情,也要分析掂量,不可自我陶醉,以至最终失望。

在另一次盛大的晚宴上,我有幸参观到私人收藏的珍贵的中国瓷器,都出自康熙和乾隆年间的官窑,而且几乎都是大件物品,诸如立地瓷瓶、巨型瓷瓮之类,即使在有名的博物馆里也难以见到。在另一房间里,满满地陈列着明代的漆器和地毯,均极名贵;还有墙上挂着的油画,用安置在屋顶上的射灯打上灯光,油彩成半透明,尤为悦目,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美的效果。

其他我参加并发表演讲的聚会还有,在纽约的上海午餐俱乐部举行的聚会,该俱乐部的成员都是过去住在上海的美国商人;在纽约市政厅举行的大会,林语堂夫人主持了这次会议,赛珍珠等好几位著名作家在会上讲述对中国的印象,最后,则由我讲“印象中的印象”;另外还有,在华盛顿美国大学妇女俱乐部和纽约音乐俱

乐部举行的聚会,以及纽约、巴尔的摩、诺福克、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等地中国留学生或华侨举行的聚会,我都先后出席,并作演讲。

纽约的几个著名银行和工业公司也邀请我出席高层职员午餐会,我即席就远东局势发表演讲,并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我深深地感到美国人民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在中日战争已持续三年多的情况下,这种关注本身,说明美国人民渴望了解远东,不仅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社会、艺术、文学、以及哲学等多方面的情况。甚至可以看到,日报的广告栏中也大量引用孔子语录,当然有很多并非孔子所说,这恐怕是孔老夫子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他们不断进取,力争德才兼备,并对天下的一切事物,尽量求知,寻根问底,以作出自己的判断。在我所参加过的各种聚会、出席过的各种会议上,所见的美国人都能充分利用业余时间,甚至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都不忘获取知识、信息,和讨论热门话题。他们阅读的书籍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几大洲和众多领域、众多课题。有关中国的读物可谓浩如烟海,销售量也特大,这一方面证明美国人有极强的求知欲,另一方面,也证明我们的旅美作家知识渊博、才思敏捷,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作家媲美。

不过,我第四次访美所获印象中,也有一些令人失望的事情,因此想起我国的长城,我们不少人在北京附近的南口或山海关见过这一世界闻名的建筑,它东起山海关,向西延伸至我国西部纵深处,依山起伏,蜿蜒数千里。可以说,长城在过去始终是我国闭关自守的象征。那时,我们对物质的、精神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上帝赐给了我们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丰盛的物产,古圣先贤为

我们树立了无数道德楷模,留下了大量教诲、训导。我们沉浸在自满之中,觉得完全不需要也不愿意与其他国家交往。这就是所谓的“闭关政策”,现在人们更愿意称之为“孤立主义”。今天,我们中国人不能不承认,西方世界前来叩关,坚持要求与中国贸易与交往,自有其道理。正如一个人绝不可能也不应该孤独地活在世上,国家也是这样。

当然,也有一部分美国人对于世界局势漠不关心,袖手旁观,这也是有原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取消中立,自动介入,并对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战争的结果却使抱有崇高理想的美国朋友感到很有些失望。美国参战,决不要求物质上的回报,在和会上也没有要求对美国的生命财产损失作出赔偿,然而,那些得到美国帮助的国家对待美国的态度,不说是忘恩负义的话,起码可以说是欠考虑的。这就使一些美国人认为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是最明智的。

然而,问题是,孤立政策是否真正行得通?中国的万里长城在这20世纪里根本不可能抵制外部世界而保护中国。不管怎样,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交通工具已使建立各种各样的国际联系成为可能。世界各国虽各处一方,却好比邻居,近在咫尺,有的邻居好相处,有的却很可恶。想把爱闹事的人或他们闹的麻烦事拒之门外看来是不可能的。想孤立,其实也绝不可能孤立,不管你多么愿意孤立,终究是不切实际,也是不可取的。

我第四次访美过程中,游览了许多地方,真是满足了我的游兴和观光欲。费尔法克斯圣公会中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同学,都先后邀请我到母校聚餐,并参观了华盛顿总统宣誓的法院。我们又从弗吉尼亚比奇出发前往威廉斯堡,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威廉玛丽

学院,该学院由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捐资,依照殖民地时代的原样修复。

从诺福克驱车前往华盛顿,沿途我们穿过很有意思的里士满市,在一条主干道旁有一个很大的中国餐馆,当晚我们就宿于大学城夏洛茨维尔,40多年前,我在这个镇上度过了3年,再来到这里,见到现代化的街道、崭新的楼群,以及镇子周围一片片设施良好的居住区,真是认不出来了。令人欣慰的是,大学原有的历史古迹,丝毫未动,照旧保留,虽然几乎被四周的新建筑,如漂亮的宿舍、餐厅等所淹没,但仍给人以特有的美感。

弗吉尼亚州最显著的变化,是建设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将大城市和小城镇都相互连接起来,对比我大学时代的可怕的乡间土路,真是天壤之别。那时,每当春天来临,冰雪融化,我们走着去潘托普或蒙蒂塞洛时,都不得不攀缘路边的藩篱,以免陷入著名的阿尔伯马尔红色泥沼中。

准备取道洛杉矶回国时,我们从芝加哥出发,先前往圣塔菲,途中游览了大峡谷,那真是我从未见到过的最奇妙的自然景观。在洛杉矶和旧金山,都有唐人街,经过翻造改建,完全不是我过去见到的那个样子了,高高的宫殿式、宝塔式的东方建筑,比比皆是,很有气派,心中不由得充满了自豪感。

只是纽约的唐人街,虽经部分翻新,看起来还是老模样。不过有关方面告诉我已有计划,将另选地址重建,建筑物将更集中,并有更多的改进。在我访问过的所有的美国城市里,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那里的华侨以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支持祖国去赢得战争。我必须向我的同胞脱帽致敬,他们中很多生活在社会下层,只有微薄的收入,但是,他们常常参加爱国募捐

集会,不仅为表达对祖国的忠诚,使感情继续有所归属,而且为了经常性地将自己辛苦挣来的一部分薪金捐献给祖国的抗战事业。

此外,过去在华侨中,地盘之争和帮派之争很厉害,而今这种坏风气已被新的团结合作的民族精神所取代,出于共同的民族利益,在美的华人小团体已结成大社团,联合起来开展一切活动。可以说,中日战争不仅使中国国内人民,而且使海外华侨都出乎意料地携手并肩,同心协力,一致对外。

我注意到在美华侨的另一重要进步是,他们都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美国教育,并同时学好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年轻的一代侨胞都能正确流利地使用国语,而他们的父母及祖父母却只会讲闽粤方言。大多数在美华侨现在也学习英语,这无论从文化还是从其他方面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语言的交流,华侨不再像过去那样在美国社会中孤立独处,而是更自觉愉快地融入当地的生活,参加各种活动,这样就有利于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对他们的种种成见。